

深读·封面故事



韩志鹏在与广州市物价局局长会谈时很激动。(资料片)



广州地铁站旁的“举牌哥”。(资料片)

(上接B01版)

4天后的9点30分,韩志鹏直接跑到物价局办公楼。这一次,他带着一纸“重开听证会”的建议,还带着20多家媒体记者。

跑上跑下50分钟,韩志鹏没见到一个局领导。

最后,一位科长露面,称“今天全部领导都出去开会了”,然后在走廊里接下了韩志鹏的建议书。

韩志鹏:“按规定是多少天能够回复?”

工作人员:“多少天不是我说了算。”

韩志鹏:“你刚才不是说有规定吗?”

工作人员:“按照信访规定,信访是15天答复。”

……

一番追问后,韩志鹏丢下话:“那我就等15天。到时候不答复,我就再把折叠凳搬出来到你们这里坐着。”

“我要把小板凳送给他们。送小板凳的意思是:我在候着。”

56岁的韩志鹏,普通得像是广州街头常见的大叔,有些谢顶,但又苛刻、较真,会让对方不舒服。他也承认,自己较真得爱钻牛角尖。就像这次,像一个孩子渴望糖果那样,他固执地想完成“重开听证会”这个不太可能完成的愿望。

板凳还没来得及送出去,一直纠结于不能把建议书交到物价局领导手里的韩志鹏没想到,自己一个人的努力,竟然在三天后真的得到了“糖果”。

7月25日,广州市物价局局长罗家祥出面约见韩志鹏,回应他的建议和相关问题。原本,罗家祥这一天是有其他会议的。

这一消息,韩志鹏最早是通过7月24日晚上8点多的微博透露出来。

局长出面接待并没有缓解现场沟通的针锋相对。对于韩志鹏的质疑,罗家祥一一解释。

尽管称对会谈“不满意”,韩志鹏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成功了:罗家祥表示,按照信访条例,会在15个工作日内,对这些建议给予正式的书面答复。

“我对‘板凳委员’的称呼很自豪,我一直说,我不是一个人在奋斗。”

微小行为,也可影响公共事务

的确,韩志鹏并不孤单。

在他身后,最近出现了一个以一己之力影响政府公共决策的故事,这发生在刚毕业的大学生区佳阳身上。

并且,故事有一个圆满的结局。

“今天,刚刚收到广州市建委给我的对可行性报告书面回复的快递。”7月28日,区佳阳对本记者说。

5月份,她在微博上发起“征集大拇指撑广州建委”活动,从而得名“拇指妹”。现在看,征集可以暂告一段落了,因为这原本就是要“鼓励”建委公开1.5亿元光亮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。

这份回复称,报告正进行专家评审,审批后,建委将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有关要求公开。

“蚍蜉”之力



“拇指妹”送给广州市建委鸭梨,希望他们帮其分担压力。(资料片)

7月29日凌晨1点56分,区佳阳把这份“关于对区佳阳公开政府信息告知书”以图片形式上传微博,建委的红头文件很醒目。

23岁的区佳阳原本在一家NGO工作,刚刚由实习转为正式工不久。

她的努力始自今年5月初。

4月,广州市建委宣布拟投入1.5亿元升级改造光亮工程,工程电费每小时约5万元,由政府买单。

“是不是可以申请公开光亮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呢?”区佳阳在网上发起号召,并屡屡到建委和发改委窗口递交申请。

等待中,“拇指妹”还曾向发改委赠送过皮球。“拇指妹”说,赠送皮球不是“讽刺”,而是“鼓励”。而工作人员也很有风度地接过皮球,表示“非常感谢你”!

转机发生在7月7日。

广州市建委主任侯永铨约见区佳阳,解释1.5亿元光亮工程原来的设想是,边设计方案招标边报批可行性研究报告,市民提出意见后,建委已经暂停设计招标。

官民对话,这是送给区佳阳的“最好的礼物”。

“一开始,我并不认为靠我一个人的力量,可以左右得了那么大的工程。”行动带来的效果让区佳阳很意外,“我的经历能让更多人意识到,即使个体很微小的行为,也会对公共事务产生影响,这就是我最的心愿了。”

而反对广州花巨资统一改造地铁站的“举牌哥”陈逸华也从未想到,个人行为最终会变化为巨大的民意诉求,从而改变重大决策。

“举牌哥”之前,“口罩男”同样以出格的形式质疑“花基和路缘石为何要换成花岗岩”,并得以和广州市建委主任对话,意见被政府采纳后,20条道路紧急停用花岗岩改造,节省了上千万元的费用。

广州,似乎从来都不缺少像“举牌哥”、“拇指妹”、“口罩男”这样的年轻人。

据公开报道,最近三年,“闪唱组”、“旧城保护小组”、“乙肝男”、“鲨鱼妹”,这些刚刚或还未

进入社会的年轻人,先后在社会公共利益事件面前,大声呐喊表达诉求。

“这些人身上,有着强烈的公民意识,又采取了独特的公民行动方式,问政议政,表达意见诉求,参与公共事务和公共生活,捍卫公共利益。”7月27日,暨南大学舆情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朱磊告诉本报记者,对区佳阳这些年轻人,他们也一直很关注。

用温和“逼”出来的官民互动

圆满的结果并不能说明过程也是一帆风顺。

在公开1.5亿元光亮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过程中,“拇指妹”遭遇了一场两个当事部门都不承认的“球赛”。

第一次去广州市建委窗口申请公开是在5月17日,对方建议她向报告审批部门——广州市发改委咨询。

半月后,发改委工作人员现场答复称,公开报告并非发改委的工作,随后书面回复表示光亮工程未到审核报告阶段,建议向工程主管单位建委咨询。

“球赛”进行到第49天,区佳阳再一次出现在建委,送去一只鸭梨,希望建委能够帮其分担“压力”。

“工作人员婉拒说:作为公务员,不能收群众的一分一毫、一针一线。我只好把‘鸭梨’自己消化掉。”7月27日,区佳阳笑着告诉本报记者。

倒是“乙肝男”雷闯赶到了现场,吃了几口“鸭梨”,表示愿意替区佳阳分担压力。

韩志鹏也有这样的感受。对于和物价局局长的这次面谈,他认为,罗家祥是“被民意、被舆论、被压力逼出来的”。

但他还是表扬:“仍然看得出政府还是很阳光的。”

区佳阳也很庆幸,她是在广州做这些事情。

“这件事如果发生在其他城

市,我想可能会被和谐掉了吧。更不会有一个建委主任出来向我这么一个老百姓解释。”区佳阳很享受这样的良性互动,“被提意见的部门,不会呵斥你,也不会打击你。”

韩志鹏也承认,广东有较多的诉求渠道。适当把一些不良情绪释放,便于问题的沟通和疏导。

而朱磊认为,广东受岭南文化和西方、港台气氛的影响,个人公共意识相对要强一些。

“经济发展起来以后,人民群众的诉求越来越多,像广州出现的‘口罩男’、‘光头哥’、‘举牌哥’,反映的都是一种社会诉求。”7月初,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广东省委书汪洋做客南方网与网民交流,表示对这些公民个体并不陌生。

但让“拇指妹”、“举牌哥”、“板凳委员”、“乙肝男”们更津津乐道的,是与政府部门博弈的技巧。

“跟政府部门博弈,也是一门学问。一个人抗衡不了,如果你懂得运用策略,不直接对抗,用很温柔又不缺乏力量的方式,就能达到好的效果。”“乙肝男”雷闯这样总结。

记者发现,“温和”这个词语,也不约而同地出现在“拇指妹”、“举牌哥”的叙述中。

“不能走得太快,如果你提出的建议它没法做到,政府肯定很难去回应。如果跟它步伐差不多或稍前一点,它行动起来就顺当多了。”成立不到三年的公益团体“拜客·广州”,总结出颇有成效的与政府打交道的“窍门”,无论如何,要把问题纳入双方良好的互动中去。

于是,这个老给政府“挑刺”的团体,不仅成功地送给了时任广州市长张广宁一辆单车,期望他能体验骑车的感受,还在省委书记汪洋骑行大学城绿道时,邀请他加入市民车队。

“我们觉得这种方式是最自然,也最平等、最平和的一种方式。”广州地铁公司新闻发言人钟学军曾对“举牌哥”陈逸华做出这样的评价。

“非常规”表达方式的困境

在朱磊看来,“板凳委员”、“拇指妹”、“举牌哥”在各自事件的发展中,用的其实是一个“剧本”。

“他们以自身为媒体进行传播,一旦采取个性的表达方式,就容易争取到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舆论支持,酝酿上升为公共事件,进而形成大众的民意诉求。”朱磊对本记者说,这其实是一种外力的“倒逼”。

相比广州接连出现的“哥”与“妹”,远在北京的北京忆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主任李劲松就显得有些“孤单”了。

真想不出公开“三公”消费关李劲松什么事,但他却在5月份接连向各个中央国家部委申请公开“三公”消费开支的信息。有关部门回复:这些数据跟你没有直接关系,你没资格申请。

李劲松下了决心:若有部委在7月30日之前仍不予公开,他就将他们告上法庭。

“我并不认为靠我的申请就能成功,但是,有公开的规定和要求,这只是时间问题。”

李劲松把广州几个人的诉求称为“非常规”的方式。他认为,还可以有更聪明、更简单的表达办法。

“如果他对你的书面申请不回复,那你可以去找他们上级或去法院起诉。”李劲松觉得,“非常规”方式的效果有着不可预测性,走的不是法治的路子。官方和个体都有这种基因的话,很容易会陷入一种恶性循环,离法制远了。

“采用这种非常规的方式,如果政府怎么都不理你怎么办?难道你还能去拼命吗?”

对于香港66岁老太朱绮华申请司法复核环评报告,逼停造价逾700亿港元的港珠澳大桥的事,区佳阳也曾听说过。她告诉本报记者,她自己也不知道该用何种方式来表达情绪和想法。“用非常规的表达方式,有一点无奈。似乎在国内,只有这种方法能引起大众的关注。也许,通过法制的方式,会石沉大海吧?如果香港老太来到内地,情况也许会艰难一些吧。”区佳阳说。

同样,陈逸华一开始也并不是要通过“举牌”反对地铁一号线返修工程。

他曾表示,他到服务总台反映,但是一直没有下文,也没有回复。“有些东西要引起大家关注……(举牌)比较快速一点。”

“法制健全,诉求渠道畅通的话,这种非常规的方式自然就不存在了。”朱磊说。

只有韩志鹏还在等待。他对这件事的信心,和之前的建议一样坚决。

此前他曾建议白云山禁车。第一年,公文被驳回;第二年,白云山管理局负责人约见;第三年,直接在提案中明确,请广州市政府办公厅处理答复。

终于,他等到了一纸政府令。“听证会这事到现在还没完。”7月27日,韩志鹏对本记者说。

他说,如果物价局最终回复不同意二次听证,韩志鹏将找听证方案的定价机关——市政府,不排除找分管物价工作的副市长申诉。